

美蘇關係檢討



史諾原著 傅雷譯

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（譯者代序）

我介紹史諾這幾篇文章的動機不止一個。傳佈美蘇關係的智識固然重要，反躬自省的感悟尤其重要。

二次大戰結束以後，國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場，觀察國際關係。進步份子也有近乎教條主義的成見，同時更受熱情的朦蔽。服膺某種主義的，以為天下的是都在這一面，天下的非都在那一面。不幸事實並不如此簡單。儘管主義是對的，政策是對的，戰術還可能有錯誤。而且一個國家無論奉行何種主義，決不會一成不變。比宣傳與號召更重要的是生存，爲了生存，縱使與主義背道而馳的

政策也得執行。我們承認它這種權利，但若它求生的戰術妨害了另一個國家的生存，這個國家當然也有反抗的權利。然而信仰令人對這麼簡單明瞭的事實也會盲目。美蘇關係的是非，有史諾的文章分析得很詳盡，暫可不提。戰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，犯了很多很大的錯誤，不但有目共睹，而且大家已交相指摘。但是蘇俄對我們的行為也不見得全部友好，完全平等。紅軍在東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廠，進步的刊物噤若寒蟬，不贊一辭。中蘇條約公佈，國內所有的報紙，不分派別，一律頌揚。這些現象怎麼解釋呢？難道我們獨立的人格還沒建立？難道我們不會用自己的眼睛觀察，用自己的頭腦思想？

一九三七年德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，蘇聯與芬蘭開戰這兩件事，聽說在延安也有少數人懷疑，但既不敢明白宣說，也不會推究出一個真正的原因。那時，譯者曾經跟一二青年朋友討論過，他們無論如何不承認蘇聯也有它的國家主義。在純潔的心靈中，國家主義似乎與蘇聯的理想與主義根本不相容。青年人爲了維持

固有的信仰而不承認現實，固然可以原諒，但究竟不是一種進步。

前年十一月中蘇條約公佈以後，有一般少數人士，一方面要求民主，贊成社會主義，一方面又重視國家權利，把正義與平等看做高於任何主義；他們當時很嚴厲的指摘中蘇條約，特別關於中東路與旅順大連的部分；不久他們又指摘紅軍的掠取東北工廠。但大多數人士認為這種態度是『頭腦不清』。的確，到現在還有人覺得中國只能有兩種人：不是親蘇，便是親美；反蘇的必親美，必近乎反動，甚至就是國民黨的尾巴。正如國民黨右派認為親蘇的必反美，必近乎異黨奸匪，或竟是共產黨的尾巴。他們都不能想像另一種人，抱住了自己的良心，不問對方是誰，只問客觀的事實；既不親蘇也不親美，既不反蘇也不反美，但誰損害了本國的利益就反對。在這樣的左右夾攻之下，真正的輿論就難以建立，而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日子也愈加渺不可期了。

美國人的錯誤，在於只看見自己的利益，——俄國人恐怕也難免吧？——中

國人的錯誤在於不看見自己的利益，或者只知道用別人的眼鏡看自己的利益。推本窮源，我們太不瞭解蘇聯，不過跟美國人的誤解蘇聯，剛好處於兩個極端。雖然觀察的角度，用意，結論，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全都相反，但所誤解的對象——蘇聯外交政策的本質，是相同的。

史諾揭示蘇聯的二重人格，解釋現實主義政治的原則，狡兔三窟式的蘇聯外交，用歷史與事實，證明國家主義在蘇聯外交政策中不但存在，而且居於第一位。另外一個熟悉歐洲問題的記者，約翰·史各脫，在一九四五年就分析過『蘇聯的三度空間的外交』。（見本書附錄）在某程度內，國家主義不是一個壞名詞，蘇聯的友人毋庸爲之諱言，倒是應該當做客觀的事實加以研究。

『他（馬克思）是宗教領袖中比較實際的一個，因爲他整個的方法，使信徒可以放棄或修正他的預言，如果那些預言和實際經驗相抵觸。』

『……在現實主義的政治中，一個國家如一個明理的個人一樣，決不允許理論

來干涉，掙扎圖存的實際鬥爭。」

『：蘇聯每個領袖都有兩重人格：第一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，關心當前的安全與勢力問題；其次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，社會主義者，理論主義者的信徒。這種二元的情形見之於事實的，是蘇聯政府一方面努力與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合作，另一方面而努力支持共產國際——它却是立誓要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……所以外國的政治家與觀察家，連美國的共產黨員在內，對於俄國在國家立場上生命攸關的利益，和往往純粹是理論的抽象觀念或宣傳作用，老是攪在一起弄不清楚。』

『一切蘇聯的宣言，實在需要同時用兩副眼鏡去讀的。』

我想，像史諾這一類的觀察，對國內多數人士還是很新鮮的。他們似乎停留在相信世界革命不久即可來到的階段，從沒留意俄國新經濟政策的產生，李維諾夫在國際聯盟的外交，近十五年蘇聯對中共態度的改變等等，究竟由於何種原因，反映蘇聯政策怎樣的轉變。他們不知道『蘇聯的代表，不論在國內國外，以

純粹國家主義者立場說話的時候居多，而以馬克思主義者立場說話的時候較少；但兩種立場兼而有之的時候還是最多。『他們不像史太林一樣相信兩個不同的制度可以並存，可以和平合作；反而因美蘇關係的緊張，更加強調兩個制度衝突的不可避免。其實，光明的來到，決沒有熱情的信徒所想像的那麼快，達到光明的路也並不是只此一條，並無他途。半世紀來，多少國家實行了議會制，但有沒有兩個國家的議會制是一模一樣的？資本主義的革命到現在還沒完成。以爲光明就會來，是低估了敵人的力量；以爲光明的路只此一條，社會主義只有一種，便好像『教皇無誤』說一樣，會產生不容忍與迫害，從而妨害改造世界的大業。而有意無意的主張『與資本主義的戰爭不可避免』，更是忘記了下一次戰爭不僅是某個社會的毀滅，而是全人類的毀滅。然而這一點，不但史太林明白，連美國的軍人也明白。

對於國內問題，中共從十餘年的實際政治經驗中，似乎已覺悟到時間與空間

的重要，懂得了『事實的邏輯強於任何的邏輯』。否則，西安事變不會那樣的結束，抗戰根本不可能，而新民主主義也毋庸提出了。但他們還沒機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露面，所以表現在內政上的一部份智慧，在外交上就沒有，只要看延安報紙對美國的批評就可知道。

在批評國際局勢時，非共產黨的人，照理更應當持重；但他們太重視抽象的理論與機械的教條，忘記了政治是一切科學中最實際的；太着眼於未來的烏托邦，忘記了自己的生存，種族，時間與空間，使敵人振振有詞的把帽子亂戴。我順便提到這一句，並非勸人慎防帽子，而是指出過於重視理論的表現，在內政上並沒建設性的效果，反而把無黨無派的面目弄糊塗了。我也決不提倡狹義的國家主義，但像歌德與席勒，在日耳曼四分五裂之時自命爲『世界公民』，距離現實究竟太遠了些。倘使我們的最後目標，眼前會妨害生存，那末只有把握當前的問題，就事論事，把未來的鵠的暫且擱起。這並非放棄目標，正如史太林求和平的

政策，並非就是放棄共產主義。以我們的現狀而論，遇到任何友邦以國家主義對付我們時，我們單單壓制自己的國家意識，眼睛只看着美妙的理想，決非掙扎圖存之道。委曲求全未始不可，有時甚至必需，但委曲求全只是一種手段，並非目的；而且自己心裏要明白這是『委曲』。至於在錯綜萬狀的國際爭議中，假如分不清雙方的真主意與假姿態而一味作左右袒，或過事張皇而誇大局勢的危險，或跟着旁人抨擊對方（正如普通美國人對蘇聯的態度），甚至當蘇聯尚未放棄和平合作的時候，我們倒以為不可避免的衝突就要來到；那末，除了暴露自己的幼稚以外，對世界和平只有百害而無一利。

戰後世界的動盪，大半是暫時的。三强的力量遲早會覓得一個均勢。在平衡的局面（不問這局面只能維持十年還是廿年）未實現之前，一些表面的擊撞，絕對不是可以燎原的火星。美蘇之間並無當前的利害衝突，雙方的經濟摩擦，過去沒有，將來也很少可能。蘇聯既不需要國外的原料，也不需要國外的市場。像英

國反對派 工黨 克羅斯門所說，現在決不是慕尼黑的前夜。那末美蘇關係的緊張，真是軍火商或戰爭煽客煽動起來的嗎？或者如蘇聯所宣傳的，是獨佔資本主義必然的趨勢嗎？我想，雖然美國人認為左傾的史諾，也不會肯定這種說法。史太林說過，資本主義國家再不能包圍蘇聯，即使他們心裏想要，也辦不到。

事實是，在重新支配勢力圈的國際會議中，總是由恐懼心理控制着各國的外交家。恐懼的原因不外乎對自己缺少信念，對旁人多所誤解。美國固然流行恐蘇病，蘇俄也有遺傳的排外主義與共產黨的傳統恐懼。要消除他們的猜忌而促進了解，不是我們能力所及。但第三者少動感情，少作褊袒，在消極方面至少可以助長他們的猜忌。雖然馬歇爾調解中國事件的報告書，確言中共並沒得到蘇聯的接濟，但美國人始終覺得中共的擴張即蘇聯勢力的擴張；再加中國反動派的惡意宣傳，使美國更覺得精神上受了蘇聯的威脅。所以非共產黨員的中國人，大可不必加強美國人的錯誤印象。我不說我們為此就不該抗議美國對我們不公平的行

爲，但至少要使美國人懂得，這種抗議純粹是爲了國家生命攸關的利益，而不是黨爭的手段，更不是附和另一個國家的表現。尤其在莫洛托夫望天討價，美國人着地還價的當兒，儘管他們面紅耳赤，惡言相向，第三者也可稍安毋躁，不必像美國共產黨員一樣，動輒鑽入政治牛角尖。

反之，倘使我們的報章雜誌，除了頌揚俄國式的民主，殲滅法西斯的英勇戰蹟以外，還能分些力量，客觀的報導蘇聯政治，外交，社會各方面的情形，分析一下史太林不要戰爭的原因，其結果不但對我們國內政治有良好反響，即對美蘇關係也不無貢獻。

星期六晚郵的總編輯，在發表史諾本文之前加了一封『致史太林元帥及全體讀者的公開信』作爲按語。據說這幾篇文字在編輯會議中引起的爭辯，『可以和莫洛托夫，貝文，貝納斯最激烈的論戰相比』。編者又說明兩點：『第一，美國人民是素來喜歡公平的，對於俄國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，應該從各方面加以觀

察。過去一年中，本刊曾披露不少文字，客觀的暴露蘇聯令人訝異的行爲。史諾並不想替這些行爲尋求恕辭，而是想解釋這些行爲後面的邏輯，認爲我們在指責或糾正蘇聯行事之前，應當先瞭解它的原因……第二，編者相信史諾這些文章只能增進對俄國的瞭解，幫助贏得世界和平……」

史諾本人的態度也非常持重，公正。在介紹俄國人的見解時（即第二篇），通篇用幽默口吻。這一點我特別提醒讀者，並非我低估他們的程度，因爲有人譯過並且發表過這第二篇，把其中挖苦的反話統統變成了正面的肯定語，和作者原意剛剛相反。史諾說伊凡·伊凡諾維區如何偏執如何頑固，乃是避免傷害美國人的自尊心，也因為星期六晚郵一向是美國右傾的保守派的刊物。

史諾勸美國人『學一學怎樣去瞭解蘇聯的語言，然後再去搜尋失望的結論，那並非爲討好俄國人，而是使我們自己的血壓不要昇高。』我却要請中國的讀者學一學怎樣去瞭解美蘇雙方的語言，不要把人家的戰術過於當真，吶喊助威不要

過早。那並非爲討好美國人，而是使自己的眼目清亮。關於美國內情的材料，正反兩面，美國人就有不少可以信服的文章供給我們。而涉及蘇俄的，反面的材料既不能輕易採取，正面的又是一味歌功頌德，少有實質的客觀的報導。可是跟一個有價值的人做朋友，光是沒頭沒腦的恭維只能招他輕蔑，替他護短只能妨害他的進步，同時又替他樹立敵人。何況我們的地位是要做美蘇的橋樑，而非美蘇的戰場！我們在兩大之間處得好，世界就有和平，而我們還來得及真正爬到五強的地位；倘使投入任何一方面的懷抱，整個人類的前途都不堪設想，遑論中華民族了。

最後，我相信我的讀者對美國多少是有抗疫性的，而對蘇的軟心腸却未必全部合理。所以我特別針對這一點說話。至於揭發美國人的錯誤，史諾的原文十分之九都是，用不到再強調了。

史諾還暗示我們一個健全的原則，他認爲美蘇的不協調是由於雙方的誤解，

而非由於雙方的惡意。——倘沒有這一點最低限度的信念，人類祇有坐待下次大戰來把它毀滅。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也可以應用同樣的解釋。但一年半以來，除了日誅筆伐以外，我們有沒有點破美國人的迷夢，有沒有幫助他們瞭解我國的實情？對我們陰謀家在國外的歪曲宣傳，有沒有提出反證來加以糾正？顯然，美國人已開始陷入中國的泥淖，即以資本家自身的利害而論，也已冒了極大的危險；他們不知客觀的條件，使中國任何形式的政府都需要與美國和平合作，所以他們的某些恐懼純粹是杞人憂天的幻想病：如此簡單的道理，我們有沒有費心給他們解釋？——我們讀了史諾的文章，不能不有這樣的反省，而且這也正是時候了。

三十六年四月四日

在校對這篇譯序的時候，因為旁的問題而翻查舊報，無意中發見三月卅日文匯報上發表的張東蓀先生「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」一文，其中論點有許多正與鄙見相同。我提出這一點，並無意思借張先生的聲望以自重，而是證明像我這一類的感想，在社會上還是很普遍的，不過很少人形諸文字的提出罷了。

四月十七日附記

目 錄

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（譯者代序）	一
正文：美蘇關係檢討（史諾原著）	
一． 爲什麼我們不瞭解俄國	一
二． 俄國人怎樣看法	二九
三． 史太林必須和平	五七
附錄：俄國三度空間的外交政策（史各脫原著）	
一． 歷史的基礎與發展	八五
二． 戰爭與和平的大計劃	九二

一．爲什麼我們不瞭解俄國

雙方的誤解由 於字義的不同

我們誤解別的國家，往往是由於用字的不同，由於所用的字的價值不同，這種情形在今日的對蘇問題中尤爲顯著。

俄國的歷史，語言，文化，馬克思主義的觀念，加上沙皇時代的許多隔世遺傳，構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背景。在這個背景中，某些字包含某種意義。一旦變成了英文，却往往是另一種意義了。因爲英文是跟着幾百年來制度、思想、習慣的演變而長成的，而那些制度、思想、經驗，俄國從未有過。

迄今爲止，隔了大陸交談而毫無隔膜的，只有科學家，音樂家，與棋手。政

治家爲最近的將來寫下了不少國際公式，但他們連對公式中的基本觀念，都沒有下過一個定義。倘使加以努力，雙方對字義的瞭解，未始不能接近。其實，從德黑蘭會議起，我們跟蘇聯的會商，最後目標無非是爲了這種接近。倘沒有共同的字彙，一切努力都將白費。

在聯合國憲章中，在聯合國機構所發表的各種演詞與文告中，就有字義的衝突。譬如『人權』這個名詞，舊金山會議的確化過心血想給它一個定義。俄國人要把『工作權』包括在內，有些國家就皺眉頭；美國要把『自由企業權』包括在內，英國與俄國又一致反對；有人提議索性全部採用一六八九年的英國權利憲章，大家又覺得不妥。結果爲了便利會議的進行，把尋求定義的工作很快的放棄了。這放棄也許是一樁大錯。從那時以後，聯合國所把握的問題，其重要性恐怕都及尋求『人權』一詞的定義，——那實在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。

在巴黎，倫敦，紐約，莫洛托夫，貝文，貝奈斯諸位先生，一而再，再而三